

传世漆器保护修复的东西方路径比较研究

马明新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 传世漆器保护修复在不同文化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法、材料与理念体系。本文系统梳理亚洲与欧洲漆器保护修复的材料体系及核心修复理念, 揭示东西方两大修复传统并非“传统材料”与“合成材料”或“东方经验主义”与“西方科学主义”的简单二元对立, 而是多种知识系统、制度结构、材料条件与价值判断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两种路径的差异, 是上述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折射出不同文化语境对“真实性”与“文化遗产”内涵的深层理解分歧。本文进一步指出, 在全球化合作日益频繁的当下, 跨文化漆器修复实践应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对峙, 在对话与协商中建立兼顾原生文化传统与材料稳定性的保护决策框架, 以期实现对传世漆器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永续传承。

关键词: 传世漆器; 保护修复; 传统材料; 合成材料; 可逆性; 真实性

DOI: 10.65976/3106-1540.2026.03.01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th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Inherited Lacquerware

Ma Mingx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al lacquerware have formed unique methods, materials, and conceptual systems in different cultural region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terial systems and core restoration concepts of lacquerwar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 revealing that the two major restoration traditions in the East and West are not simply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synthetic materials" or "Eastern empiricism" and "Western scientism", but rather the product of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knowledge system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th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weaving of multipl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reflecting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s of "authentic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globalization cooperation, cross-cultural lacquerware restoration practices should go beyond either or stance confrontation, and establish a protection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that balances nativ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aterial stabilit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of lacquerware, a common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Keywords: Inherited lacquerware; Protection and repair; Traditional materials; synthetic material; reversibility; authenticity

我国传世漆器保护修复方法与材料的研究起步较早, 明代漆艺家黄成所著《髹饰录》中即有探讨漆器老化的“断纹”和修复方法的“补缀”“补缀之二过”条目, 并以“相当为妙”“令缝痕不觉”为修复的评判标准^[1]。积累长期实践经验后, 逐渐形成了一套沿用原材料、原技法, 注重实用性、观赏性以及传统技艺传承应用的“传统修复工艺”。

若将视野扩展至东亚与欧洲, 便会发现传世漆器保护的历程在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方法、材料与理念体系。日本与我国类似, 漆器修复与制作工艺一脉相承, 早期修复工作的重要档案《日本美术

院雕刻等修理记录》(1899年-1944年), 可见漆器修复“开裂或损伤部分以漆加固, 填补缺损部分并适当施加古色”, 并在多处提到“古色”处理的重要性^[2], 随后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 逐步形成了以“现状维持”为方针的修复体系^[3]。欧洲地区则因亚洲生漆不可获取等约束条件, 早期借用西方传统家具的制作与修补、欧洲仿漆的表面装饰的处理经验, 1964年《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物保护倡议的影响下, 合成树脂开始应用于传世漆器修复, 发展出一条重视历史真实性、修复材料可识别性的修复路径。

然而,当我们查阅海内外传世漆器保护修复的文献资料时,很容易将东西方的不同修复路径简单归纳为“亚洲地区使用传统材料,欧洲地区使用合成材料”,但通过历史梳理可知,现实并非如此简单。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最终选择、使用某种材料的决策原因,而非材料本身。本文旨在系统比较东西方漆器保护修复的材料体系与核心修复理念,揭示两大传统差异的深层逻辑,并为跨文化漆器保护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亚洲传世漆器保护修复路径

中国传统漆器修复工艺的产生,与古代漆器的使用、维护、赏玩与收藏过程密不可分。在长期的实践中,修复师积累了一套以师承制为主要传承模式、以漆器制作原材料为主要修复材料、沿用传统漆器制作工艺、注重观赏性及传统技艺传承应用的经验体系。早期中国的漆器修复更注重实用功能与观赏性,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可逆性”概念,修复更多是一种维护、保养行为,对原作与后加层并不进行严格区分。

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以来,各博物馆及研究所相继成立漆器修护室和研究中心,分别从藏品分析检测、修复保护实践、生漆材料分析实验、传统技法研究与学术传播等方面展开工作,逐步确立了以“科学保护,整旧如旧”为总体方针^[4],以科学调查、实验分析与传统修复工艺相结合的保护路径。故宫博物院漆器修护室对宫内明清旧藏传世漆器文物进行科学分析,延续传统修复技艺开展修复保护工作;西安生漆涂料研究所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漆器基础理论与生漆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中央级科研院所,以保护修复领域的应用研究以及生漆材料的研究为主;浙江省博物馆内设古代漆器研究中心,主要围绕漆器工艺史、艺术理论以及元明清雕漆等方向开展学术活动。经多年修复实践与理论研究证明“传统文物修复技术仍是修复中国特有文物的首选技术”^[5],并强调“传统生漆在漆器文物修复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性”^[6]。

日本现代文物保护研究起步较早,1929年《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文物指定制度,规定任何形式的转让、流通、更改、修复等需取得政府的许可与监督。1950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并在1975年修订时新增“选定保存技术”条款,将传统修复工具、材料的制作技艺与修复技术列为保护对象,漆器修复技术也被列入其中,明确了传统修复方法在兼容性、工艺连续性和长期维护上的独特意义。

除了1960年代至80年代左右受西方影响短暂使用过合成树脂之外,在重视传统工艺技术传承的文化语境下,日本的传世漆器保护与我国相似,采用原技法和传统天然材料,综合技艺传承与观赏需求进行补配和形状复原的保存修复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将修复视为对原有工艺传统的延续。

二、欧洲传世漆器保护修复路径

与亚洲地区以原技法和天然材料为中心的保护路径不同,欧洲地区早期对亚洲漆器的修复,更多借用西方传统家具表面装饰的处理经验,常使用虫胶、蜡及清漆等西方传统材料进行修复与封护。1950年代高分子化工产业的兴盛,使合成材料作为新兴修复材料开始引入文物修复领域,之后也开始应用于亚洲漆器修复。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陆续建立,藏品的保管、展示、修复工作也逐渐制度化、档案化。漆器也逐渐脱离原本作为器具的使用功能,开始作为藏品进入公共收藏体系,成为了美术史及工艺史的研究对象。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保护修复的目的与方法的重新审视,在与国际文物保护运动理念的影响下,更强调真实、不加改变地传承历史文化信息。

1964年《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物保护倡议的影响下,保持文物的历史真实性、最小干预、修复材料的可逆性,逐步成为漆器修复决策判断的重要依据,修复目标从恢复功能与外观转向保存历史物证。然而,1980年代左右,部分合成材料相继出现老化、脆化、产生交联反应难以去除等问题,促使欧洲修复界开始重新审视合成材料与漆膜表面的适用性。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反思物质真实性的传统,并将文化语境纳入真实性考量^[7],使得在漆器修复中兼顾原生文化传统与材料稳定性的双重考量逐步成为共识。

三、传统材料与合成材料:两大平行的修复材料体系

通过对东西方传世漆器修复报告书和调查研究等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东西方在常用漆器修复材料的选择、配比与修复介入度上,构成了两套近乎平行技术实践传统。

(一) 传统天然材料体系

亚洲地区从古至今一般使用以生漆为代表的天然传统材料,修复方法为原制作工艺的延续。生漆作为漆器制作的核心原材料,也是修复中最核心的材料,其用途可大致分为加固、粘结、补配(填充)、封护、随色五类。天然胶类材料包括骨胶、鱼胶、皮胶等动物胶,桃胶、海藻胶等植物胶,以及面团、米糊等淀粉类胶料,或单独使用、或与生漆混合制作粘结剂。矿物粉料如灰、砖灰、陶土、砥粉、硅藻土等,主要用于补形、整平和增强漆灰的作用。植物纤维如木粉、麻、棉、纸纤维等则通常与上述材料混合制成缺损处的填补材料。

这些材料同时也是漆器制作的基本材料,因此亚洲传世漆器修复延续原制作工艺的本质特征,是制作技术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使用历史悠久、修复案例众多,在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往往成分复杂,从材料学角度进行的物性分析尚不充分。

(二) 人工合成材料体系

欧洲地区的传世漆器修复以人工合成材料为主,

形成了以现代合成高分子材料为主体的修复材料体系。溶剂型丙烯酸树脂(如 Paraloid B72)是西方修复中最广泛使用的修复材料,可用于加固、粘结、补配、封护、随色等环节。水性合成树脂如聚乙烯醇(PVA)、丙烯酸乳液、聚醋酸乙烯(PVAc)乳液等,多用于漆灰层加固与漆膜回贴,操作简便、固化条件温和,但长期耐久性和可逆性不及溶剂型树脂。填料方面,酚醛微球、玻璃微珠、碳酸钙等常与树脂混合制成补填材料,其中B72基的复合材料力学强度较高、热稳定性好、可调控性强,目前被公认为西方漆器充填修复的首选方案^[8]。

与传统材料相比,合成材料通常成分明确、性能可控,在风险评估和可控性方面具有优势,为修复实践提供了高度灵活的材料选择。但作为修复材料使用时间较短,合成材料与器物原始材质的天然漆层在化学结构及老化行为上存在差异,其在漆器修复中的长期稳定性、老化方式与漆膜之间的兼容性,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 两大体系的差异与对话

将东西方漆器修复材料体系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两者各自的特点。东方传统强调“原制作工艺的延续”,即使用生漆等原材料进行修复,修复技法与制作技法相同,修复操作不可逆地融入历史层;西方传统则强调“物质真实性”和处理痕迹的“可识别性”,即使用与原始材料不同的修复材料,追求修复材料的可逆性,与最小的修复介入度。东方传统将使用原始材料视为文化责任,而西方保护伦理将可逆性视为科学原则。

1980年代以来,东西方在漆器修复领域的合作日益频繁,催生了相互之间的理念互鉴。东方的原材料、原技法与修复技法传承的理念影响了西方文保界对可逆性、真实性的严格标准,并开始通过科学阐明传统材料的机理;而西方的现代科学分析与实证逻辑,促使东方重新审视经验主义传统,并反思修复干预的边界等问题。

当代西方漆器修复实践中已出现向东方传统材料借鉴的趋势,尤其是在对高等级藏品进行修复时,修复师越来越倾向于在合成材料体系与传统天然材料之间寻求平衡。2004年至2008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马扎林箱修复项目为代表的跨文化修复合作,正试图在两种体系之间寻找平衡点^[9],这既是技术问题,亦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真实性”与“文化遗产”深层理解差异的伦理议题。2015年,在倦勤斋的修复过程中中外修复专家对修复展开协商,对于可见的黄竹与漆饰表层优先采用传统天然材料进行修复补全,以维护器物在东方审美语境下的“气韵生动”,而对于结构性加固及隐蔽部位的粘接,引入经过相容性测试的西方合成材料,并在修复档案中完整记录材料与施工,确保未来可识别、可移除。

四、结语

东西方漆器保护修复的差异并非传统材料与合成

材料、“东方经验主义”与“西方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而是多种知识系统(工艺背景、修复师训练模式)、制度结构(国家制度、博物馆政策)、材料条件、价值判断与公众期待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的跨文化修复合作项目表明,修复是面向未来的价值协商,技术只是实现这种协商的工具。任何不同材料与方法的提出,都不是为了推翻、否定已有的传统,而是为了解决当时旧框架无法处理的新矛盾。不同地区对于可逆性、真实性、工艺延续性、修复介入度、展示效果等问题的优先级并不完全一致,从而产生相似的损伤情况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材料选择和修复路径。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文物修复合作的日益频繁,亟需建立一种能够兼顾原生文化传统与材料稳定性的保护决策框架。这一框架应充分认识到:可逆性不仅是科学原则,更承载着文化伦理的意涵;使用传统材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回应。唯有超越非此即彼的立场对峙,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求共识,才能真正实现对传世漆器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永续传承。

参考文献:

- [1] 王世襄. 髹饰录解说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43,145.
- [2]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史料 14: 日本美術院彫刻等修理記録Ⅴ [M]. 奈良: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1978:83.
- [3] 东京文化财研究所. 文化財修復の現状と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 东京: 东京文化财研究所, 2020:18.
- [4] 张龙飞. 中国髹漆工艺与漆器保护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11.
- [5] 贾文忠, 贾树. 贾文忠谈古玩修复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175.
- [6] 华春榕. 传世漆器文物概述和修复保护实例 [C]//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重庆市文物局.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九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16:125-135.
- [7] 奈良真实性文件 [EB/OL]. (2015-03-25)[2026-0623]. <https://www.sinowh.org.cn/Home/ArticleDetail?ColumnId=82546812868947fa98e5cbbce058a35e&ArticleId=34507923-f9b3-4257-a5e4-b9bb891cb299>.
- [8] Le Hô A S, Fabre-Francke I, Thiphavong C. Properties of polymer-composite used as fills of Asian lacquerwa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2015:729132.
- [9] Rivers S, Faulkner R, Pretzel B, eds. East Asian Lacquer: Material Culture, Science and Conservation [M].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V&A, 2011.